

曾大兴 著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本书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

曾大兴 著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

◎曾大兴 著

出版 发 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583043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者: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插页:5 印张:16.5
版 次: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3 千字	印数:1—4 000 册
ISBN 7—5351—1639—6/I · 48		定价:17.40 元

如因印刷、装订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系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的学术专著。作者运用统计学和人文地理学之方法，对于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格局、分布成因和分布规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深入的探讨。全书角度新颖、史料翔实、论证充分、语言生动而流畅，不仅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而且对文化史、教育史和人才学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ISBN 7-5351-1639-6



9 787535 116390 >

作者简介

曾大兴，男，1958年生，湖北蒲圻“三国周郎赤壁”人。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师范学院（现为湖北大学）中文系本科，1982年考取湖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9月分配至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任教，1992年5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主要科研成果有《柳永和他的词》（专著）、《诗归》（古籍整理）及《李清照成长原因面面观》等40余篇学术论文。现在广州《东方夜报》社工作。

序

前年秋，大兴作为访问学者，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研究。到校不久，即光临寒斋相访。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我请问他来北大打算完成什么课题。他说北大藏书多，隔北京图书馆又近，准备抓紧这一年难得集中的时间，利用图书资料方便的条件，争取将已着手撰写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这部著作基本完成。见我听得颇感兴趣，他就进一步向我简略地介绍这部书将要包括的内容和作法。

他说这一科研方向，自从梁启超等学者开风气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有关文学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迄今尚无人着手，所以亟需有这部书来填补空白。又说他打算花几年时间，根据可靠史料，对七千位历代文学家作研究，统计出他们的朝代、出生地，绘制出分布格局表，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作宏观研究和定性描述，其结论就比较可靠了。第二步则是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种格局形成的原因。这样，既找出了文学家的分布成因，也为古代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区域教育，乃至区域旅游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他接着说，在详尽的定量分析和系统的宏观描述的基础上，他准备对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作规律性的探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也就是说，直接作用于文学家分布格局的，不是政治，不是经济，不是自然地理条件，而是文化。他又认为，文化重心往往同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是一个同心圆。历代的国都，往往也是当时的文化重心之所

在。国都交通方便，教育发达，便于人才的集中和培养。经济重心形成之后，教育会随之发达起来。教育发达了，文化重心也随之形成。这是基本规律。围绕着这一点，还要探讨不少带规律性的问题。

我听了他关于这一课题研究的介绍，很感兴趣，就鼓励他着手进行。他说，其实这项研究已经开始多时了，要是没有一些实际的经验和感受，上面的简介就可能更空泛些。他回答得很谦逊，于是就与我告别而去。

大兴在北大一年确乎很用功，收获也很大。访问期满，他要回武汉去，离京的前几天，曾来看我，同我话别，还将已写好的两章留给我看看。我看后很高兴，因为从这两章，可以窥见著者力图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结合起来，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统计结合起来，将文学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新意迭出而不哗众取宠，论断允当而不四平八稳，语言生动而不刻意雕饰，所有这些特点也是优点，显示出这部著作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我衷心祝贺著者的成功！

最近，我得到大兴的来信，说这部著作已经全部完成，即将公开出版，请我作序。盛情难却，就将我所知道的这些写在这里，谨推荐这部力著于专家和广大读者之前。是为序。

陈贻焮

1993年12月31日于北京大学

朗润园梅棣金

前　　言

我接触《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这个课题，最初纯然是出于兴趣。1987年10月，我曾经以此为题，写过一篇7000字左右的论文，但是并没有随即拿出去发表，而是搁在抽屉里冷藏了两年。因为其时我正写作《柳永和他的词》这本专著，没有时间和精力旁骛得太久。1989年8月，因为《社科信息》的编辑索稿，这篇文章才得以问世^①。现在回头看起来，这篇文章其实写得很草率，不意我的几个朋友看过之后，竟说还有点意思，嘱我得空时，不妨做得更深入一些，更细致一些。1990年6月，我把这个题目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申报，年底即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批准，并因此而得到一定数目的经济资助。这对我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压力。可以说，关于这个课题的正式研究，是从1991年初开始的。

二

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大都只注重其史的探索，而不注意其空间组合规律；只注重编年，而不注意系地；只注重其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阐述，而不注意其地域性的考察。因而这种研究往往

^①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见《社科信息》1989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全文转载。

一维的，单向的，缺乏立体感。事实上，历史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展开的。时间和空间，是事物运动的两种最基本的形式。“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即地理之骨相。读历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中许多精彩的真实的意义^①”。文学研究如果只注重其时间关系（时代性）而忽略其空间关系（地域性），许多问题就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譬如：同是中国诗歌之源，为什么《诗经》和《楚辞》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形态判然有别？同是汉赋名家，为什么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那样恢宏和瑰丽，而班固和张衡的赋则那样质朴和典雅？同是唐诗巨擘，同样漫游大江南北，同样经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巨变，为什么李白的诗歌那样的飘逸洒脱，而杜甫的诗歌则是那样的沉郁顿挫？为什么在先秦、两汉、三国、西晋和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文学家总是北方多于南方？为什么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在宋、元、明、清时期，南方的文学家又大大地多于北方？为什么在唐代还是默默无闻的江西文坛，在宋代是那样的震聋发聩，不仅文学家的数量增加了 11 倍（由 14 人增至 156 人），而且名家辈出，佳作如林，俨然执了两宋文学之牛耳？为什么领一代之风骚的宋词多艳语、多情语、多昵子态？为什么在明代文坛的复古派与革新派这两大阵营中，复古派的领袖多为北方人（如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谢榛、李攀龙），而革新派的领袖则多为南方人（如李贽、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钟惺、谭元春）？类似这样的问题，仅仅用历史的方法是说不清楚的，必须同时采用地理的方法，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研究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目的正在于借鉴文化地理学的有关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考察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分布成因和分布规律，考察特定的

① [台]王恢《中国历史地理·编著大意》。

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和文学家的作用和影响，考察文学家的分布格局与文学的地域性之间的关系，考察中国文学的地域特征，从而为文学史和文学本体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三

中国的人文地理学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及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产生了不少的人文地理学方面的优秀论著。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历代人才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则是本世纪以来的事。丁文江先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梁启超先生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可谓这一方面的代表作。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文学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则是本世纪 80 年代中叶以后的事。直到现在为止，我所看到的有关文章有两篇。一是金克木先生发表在《读书》1986 年第 4 期上的《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这是我在读了古远清编写的《文艺新学科手册》(1988 年 5 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的“文艺地域学”一章的介绍之后才去找来读的(顺便说一句，“文艺地域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远远未到成立的时候)。一是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1990 年 6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1990 年 9 月至 1991 年 7 月，我应邀去北京大学做“国内访问学者”，有机会聆听著名中国古代文学专家陈贻焮先生和袁行霈先生的教诲。1990 年 9 月 28 日晚上，我去拜望袁行霈先生。袁先生问我来北大打算做什么课题，我说想做“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袁先生说：“这是一个很诱惑人的题目；但是非常复杂”。我说：“复杂我倒不怕，只要有价值就好”。袁先生笑了。接着问我，发表过这方面的成果没有？我说有一篇不成熟的文章，发表在武

汉的《社科信息》上。袁先生问：“哪一年，第几期？”我说：“1989年的第12期”。袁先生笑着说：“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接着走进他的书房，拿出一本书来给我看。这就是他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袁先生的这本书，是他在日本爱知大学讲学期间的讲稿，1987年10月交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只是在大陆的普通图书馆不易见到）。也就是在袁先生的客厅里，我拜读了这本书的第三章。

四

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个前提性的工作，便是要考察其分布格局；要考察其分布格局，自然需要做统计；要做统计，自然需要确定统计对象和范围。这是一个颇费斟酌的事情。中国历代都有不少关于文学家的生平事迹的记载，但是正史《文苑传》《艺文志》一类的著作往往过于简略，方志和文人笔记的有关记载又往往过于芜杂。什么人可以算作文学家？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究竟有多少文学家？往往人言言殊，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和界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历代的有关原始记载来作统计，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借助于本世纪以来的有关学术成果，即文学家辞典。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有好几种，但真正比较详备、比较精审、比较权威的，还是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我听从了陈贻焮先生的意见，决定以这部辞典所收录的文学家作为统计对象。该辞典“上起李耳，以迄近代。凡姓名见于各家文学史及各史《文苑传》，或其文学著作作为各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所收者，靡不收录^①。”共6800余人。我统计了该辞典所载的自先秦至辛亥革命期间的文学家共

① 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例言》。

6 769 人(辛亥革命以后去世的 40 多位文学家不在其中),其中有籍贯可考者 6 293 人。

统计工作所涉及到的第二个问题便是籍贯。我们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乃是考察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条件对文学家的生成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我们所说的籍贯,是指其出生地,不是指其祖籍;更不是指其郡望。而历代史传碑文(包括有关方志和笔记)记载人物,往往把传主的出生地、祖籍和郡望混为一谈。尤其是六朝人和唐人,往往习惯于以郡望相标榜,甚至冒认郡望。永嘉南渡后的北方世家大族,为了显示自己门第族望的优越,为了不致混淆所谓“士庶天隔”之限,从而维护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的种种特权,“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①”,非常热衷于标榜门阀和郡望。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迁到一个新地方以后就不然了。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是世族,其它地方的王氏或谢氏就不一定是。一处地方如果迁来一家姓王的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为此就不得不郑重地声明自己的郡望,是太原王氏、琅邪王氏还是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还是别的谢氏。由于重视郡望,标榜门阀,六朝时的谱牒百氏之学相当发达。而这个时期的史传碑文(包括有关方志和笔记)关于传主籍贯的记载,便是从各种谱牒书里抄撮而来的,大都只叙其郡望,而不及其出生地。唐王室起于关陇,为了赢得山东大族的重视,亦热衷于标榜郡望。唐朝一些出生贫寒的知识分子,甚至冒认郡望。譬如韩愈,本是河南河阳人,却自诩是昌黎韩氏。岑仲勉先生《唐史质疑》云:“《姓纂》:颍川人,(韩)昶后徙陈留,唐礼部郎中韩云卿……兄子会、愈。依此则愈之旧望应曰颍川,新望应曰陈留。而顾称

① 刘知己《史通·邑里篇》。

‘南阳’‘昌黎’者何哉？唐初宰相，南阳有韩瑗；迄乎中叶，昌黎为其盛（可参《姓纂》）。正所谓门阀之见，贤哲不免，依附称谓，初不必为韩愈讳矣”。韩愈的旧望为颍川，新望为陈留，南阳、昌黎为其所冒认之郡望，而其真正的出生地，则在河阳（今孟县）。明万历中，孟县曾发现韩昶自撰的墓志铭。县志云：“此志乃出于孟县尹村韩氏祖茔之前，因以知韩公所谓往河阳县坟墓者，确在此地，而公之为唐河阳县人，今孟县地，灼然无疑”。古人因门阀之见而标榜乃至冒认郡望，可以理解，而写史的人不加甄别地照抄史传碑文和谱牒，则给后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清人卢文弨即曾指出：“（梁师亮）‘先世自河汾迁于秦，其云安定乌氏人，乃其族望也。唐人重族望，作史者往往亦相沿袭，称王曰太原，称许曰高阳，不知以地著为断。后之地理书志人物者，更无从考核矣’^①”。不言而喻，本世纪以来出版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家辞典的毛病之一，便是郡望、祖籍和出生地混为一谈。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应该说是一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30多年来一直被指定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必用教材，但是在作家的郡望、祖籍和出生地的确定问题上，便是错误间出。仅唐代部分，便有33处^②。

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也未能免俗。譬如谢超宗，乃是谢灵运之孙，连其祖父谢灵运都是在会稽出生的，可是谭编《辞典》仍称他为陈郡阳夏人；又如王融，乃是王僧达之孙。王僧达出生时，琅邪王氏这族人已在建康居住了一百多年，可是谭编《辞典》仍称王融为琅邪临沂人。

文学家的籍贯的确定，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一是古人的

① 卢文弨《武周珍卅荣德县丞梁师亮墓志跋》，见《抱经堂文集》卷15。

② 见张国光《文史哲学新探·唐代诗人占籍辨证》。

记载比较混乱，二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有关辩正材料又不多。我理解袁先生当初说这个课题“非常复杂”，主要的意思或许就在这里。我一方面以谭编《辞典》为统计对象，一方面则尽量利用现今所能见到的有关辩正材料来纠正其中的错误。尽管如此，这本书中的错误仍然难免。我殷切地期望海内外方家及时指正。我不揣浅陋地应约出版这本书，一半的目的亦在于此。

顺便要谈谈拙著关于历代皇室文学家籍贯的确定原则。皇室的第一代的文学家的籍贯一般比较明确。如汉高祖刘邦为沛郡沛县人，魏武帝曹操为沛国谯县人，晋宣帝司马懿为河内温县人，宋武帝刘裕为晋陵京口人，梁武帝萧衍为南兰陵人，但是他们的后代子孙的籍贯就不大明确了。这些人有的出生在京师，有的出生在其父祖之封地。历代诸王（藩）的封国可以确定，但是有不少人其实并不住在封国所在地，而是住在京师；他们的后人究竟是出生在其封国还是出生在京师，往往很难确定。鉴于这种情形，我们把历代皇室文学家的籍贯大都确定在皇室第一代人（开国皇帝）的出生地（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如明朝宁献王朱权的六世孙朱多煃和朱多颖，朱权这一支人世居南昌，因而将他们两人系籍于南昌，而不是凤阳；再如东晋时因皇室南迁，南迁之后出生的5位皇室文学家均系籍于建康而不是河内温县）。

这个课题的名称既为“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既云“历代”，便有一个断代的问题。如何断定一个文学家的时代属限？我们采用了通用的办法，即以卒年为限。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出现新的麻烦。但是这个通用的办法也难尽人意。譬如张炎，通常称他为元代人，然其主要的生活和创作历程却在南宋。好在我们考察一个或一群文学家所赖以生成的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时，往往既考察其现实状况，又考察其历史发展过程。我们考察张炎所占籍的杭州的人文地理环境时，并不因其为元代人，只考

察元代的杭州而置南宋时的杭州于不顾。

五

这个课题，仅仅是关于“文学和文学家的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粗浅的尝试。从选题到完成，都得到有关专家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文学学科组诸位先生的厚爱，感谢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和陈贻焮教授的指教。我在北大做访问学者期间，具体指导我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导师是陈贻焮教授。陈先生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他亲自为我审订了《两汉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这一章。临结业时，他为我的这个课题写了一个鉴定。鉴定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这个课题，意义重大而难度不小。我审阅了该书中《两汉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章，觉得该文资料翔实，方法辩证，统计可靠，分析细致，论断精审，有很高学术价值，无论对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对古代文化史、古代教育史等的研究，都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此文虽是书中的一章，却充分显示了该书的特点和优点”。这份鉴定现在还存放在中南民族学院的科技档案室里。需要说明的是，陈先生审订过的这一章，我在最后统稿时作了一些变动。三分之二的内容（即“分布格局”和“分布成因”这两节）放在本书第二章里，三分之一的内容（即“分布规律”）则放在第十章里。陈先生的鉴定包含着老一辈学者对青年一代的鼓励与厚望，实际上我的这本书不一定就达到了他的这个鉴定标准，只是体现了我向这一标准所作的种种努力。

业师张国光教授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写作，并惠赠他新近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文史哲学新探》，使我有幸拜读他过去并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唐代诗人占籍辩证》，从而纠正了初稿中的好几处错误；同学兄周腊生教授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状元有年，

得知我做“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欣然惠示其未刊稿《中国古代状元研究》，使我得以明了元、明、清三代的状元分布与文学家的分布基本上同一格局，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论点。中南民族学院计算机系的宋中山先生，利用计算机帮我做统计表格，节省了我的不少精力。凡此，我都永远铭感于心，并藉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周秦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1
第一节 分布格局.....	1
第二节 分布成因.....	4
第二章 两汉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18
第一节 分布格局	18
第二节 分布成因	27
第三章 三国西晋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37
第一节 分布格局	37
第二节 分布成因	46
第四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61
第一节 分布格局	61
第二节 分布成因	90
第五章 隋唐五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102
第一节 分布格局.....	102
第二节 分布成因	132
第六章 宋辽金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162
第一节 分布格局.....	162
第二节 分布成因	206
第七章 元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245
第一节 分布格局	245